

談「中美早期外交史」

羅惠光

「中美早期外交史（一七八四年至一八九四年）」，李定一著，六十七年五月傳記文學出版社印行

中西國際關係，在十六世紀以前，歐亞交通雖已有若干史實，但多遵陸而行；自從印度航路發現，歐亞交通，方有捷徑可尋。獨立的美國成為新世界的寵兒，大力向外擴展貿易工作，他如移民、傳教、留學以及國際交涉都相繼產生，因而與中國有了商務關係；中美兩國間的貿易，實發端於新獲得獨立的美國，尤其是一七八四至一八一四年此段時期，展開了往後中美關係悲歡離合的滄桑史頁。「中美早期外交史」一書，乃是李定一教授由早期出版的「中美外交史，第一冊」加以改寫、補充而成；新增五章約二十餘萬言超過原書三分之一，敘史斷至一八九四年，較原書增加三十餘年。在民國三十九年，著者閱及美國國務院所發佈的白皮書：「一九四四——一九四九的中美外交」，頗有感觸；又逢同年夏（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爆發，有關之言論，一時遽起，因輒以博覽相關著述，蒐集各方史料，而撰成此書。本書包括中美兩國間之商務關係、傳教事業、文化交流、移民與交涉等，亦包含兩民族間的個人、社團與政府間之交往，實為一部「外交史」（Diplomatic History）的著作。著者搜集資料，遍及臺大圖書館、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圖書館、近史所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史丹福大學胡佛圖書館、哈佛燕京學社，雖屬草創之書，然却有拋磚引玉之功。

本書計分十五章，從一七八四年至一八九四年，探索兩個民族的交往乃至於交涉經過，以簡練清晰的筆法，勾勒出中美兩國的商務關係、政治立場等。中美關係之肇始（一七八四——一八一四）、中美關係之展開（一八一五——一八三四）、中美第一次條約訂立、美國與中國內亂，中國人在美國乃至於美國教會在中國，都是早期中美關係史上的重要關鍵時刻。書末結語，更以「一九六三年前中美外交關係之回顧」，偏重基本政策之闡述，實為治史者的心腑之論。國際社會與國際形勢錯綜複雜的今天，「只有永遠的利益，而無永遠的朋友」、「敵人之鄰國便是我之潛在盟國」、「敵人之敵人便是我之自然朋友」等論調，已形成國際關係的基本定理之一。歷史雖不一定重演，但是歷史經驗却永遠助長下一代更為睿智、成熟而圓融。本書運用資料極為廣泛，中文部份如清季外交史料、道光、咸豐、同治諸朝籌辦夷務始末，並運用美國國家漁業局所藏總理各國衙門致美駐華使館原件（一八八六——一九二九年）及海國圖誌、上海市通志館期刊等數十冊資料，而在英文部份，運用有關檔案及專著為數更多，如國務院「手抄檔及普通檔案局」所藏未印行的檔案，包括駐華各使館的報告、函件以及國務院發出的指令等。以及由美國「政府出版處」所刊行的相關檔案如歷屆「眾議院記錄」與「參議院記錄」與「美國外交函件」及「美國對外關係」資料等。

美國歷史學家鄧萊迪（Tyler Dennett）曾說：「一個沒有工業的國家，僻處在不能生產各色生活必需品的地域內，再受到長期戰爭所帶來的貧困，美國距經濟自足之境實深遙遠。第二批到亞洲去的美國人，實是被迫如此，他們必須去——去到任何地方。」促成美國向中國發展貿易的重要人物，即是黎亞德（John Ledyard），他就其見聞所及，奔走鼓吹美國應積極發展與中國的貿易，終於在諸項因素互動影響下，「中國女皇號」便於一七八四年八月到達中國廣州黃埔（乾隆四十九年），展開貿易的序幕。書中談及：「一八三四年

，另一位在廣州貿易的美商福士強（John M. Fyrbes）對於中國商人推崇備至，他說：『我從未在任何國家看到有如同在此地一般的誠信無欺之高度的商業道德。』正可看出傳統中國人民講信睦鄰的風範。在一八一四年後中美貿易逐漸起了變化，貿易額顯着增加，其本質也步入轉型期。按自美國開始對華貿易起，中國即一直居於出超地位。自一八三〇年左右開始，由於英美間貿易增加及鴉片走私興盛的緣故，美國現金輸華的比例，乃大為減少。在本書第三章述及美國與鴉片戰爭的干係。著者說明：「鴉片走私幾乎全由英商包辦，但美商亦參預其間，若干人故意誇大美商與鴉片走私的關係，也有人力圖避免提到美商賣鴉片的事實，均不符史實。」又謂：「總之，在中英爲了鴉片而衝突的時期中，美商不特沒有因爲不能販煙而『血本大虧』，而且獲得暴利，留居在廣州，不僅未開罪英國，而且博得中國的好感與英國『女王感謝』，真可謂之名利雙收！」說明了史實的真相以及美國商人在華所扮演的角色之一斑。顧盛（Caleb Cushing）繼易維利之後爲駐華使節，一八四〇年三月十六日在衆議院外交委員會發言，反對美國將與英國聯合行動以強迫中國簽訂商約。「著者在本書不厭其詳地敘述顧盛任命的經過，其目的在幫助我們瞭解美國外交上的措施，經常受到國內黨爭及人事的糾纏事實；並瞭解國會議員對於外交方面所發表言論的背景，莫不錯綜複雜，微妙萬分的原委。」中美望廈條約的簽訂，使得美國在華利益得到進一步的確定。「從『中國女皇號』首次到廣州貿易到顧盛來華締結『望廈條約』，其間正好六十年（一七八四——一八四四）。這六十年間中美關係的發展，極其單純而隱晦；兩國間的關係，幾乎完全限於貿易和商務，可謂極單純；兩國商民相交往，大體融洽而少波瀾，絕少凸顯的史事發生，故不易受人重視。」雖說如此，但這正是中美關係的淵源所在。從書中更能使人領略到：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必須能適應環境方能生存下去。（此點所述「環境」一詞，不祇是靜態

的地緣關係，實亦包含一切動態的人際關係。）

在望廈條約簽訂之後，美國對中國內亂所抱持的態度，亦有極深遠的影響。自太平軍興起時，美國民間對太平天國實抱着同情的心理，但美國政府則採取不干涉政策。「一八五三年十二月美總統皮爾士（Franklin Pierce）（一八五三——五七，民主黨）致國會的國情咨文，便是代表美國政府的態度，他說：「目前中國的情況，大約可使那廣大的帝國發生重要的改變，可與之獲得更廣泛的接觸。新近任命的使華外交委員會所接到的訓令是竭力運用一切機會以開闢並擴張吾人的商務關係，不僅限於中國，且應及於其他亞洲國家。」人類歷史顯示着：一個不安定的經濟結構，往往是衝突與戰爭的溫床。近代中國遭受不平等條約的約束，加諸禍亂相尋的局勢，使得中國人民承受空前未有的浩劫。猶記唐太宗一語：「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長期動盪的中國與西力東漸所表現的肆應，實形成一部血淚交織的近代史。值得一提的是本書詳析伯駕（P. Parker）個人的侵臺政策，「他們看中了高雄地方，決定在該地作『永久性的投資與建設』。用賄賂清吏的方法，取得了樟腦出口的獨佔權，其交換條件爲每隻載運樟腦出口的商船納稅一百美元，並代清吏驅逐高雄海面的海盜」。此章分析詳盡，可與「美國與臺灣」（黃嘉謨著，近史所專刊）對照研究，亦自成研究「臺灣史」的一項專題，頗具價值。第十三章「中國人在美國」，說明從歡迎到排斥始末以及華工在美地位問題與清廷對海外僑民之政策，實道出中國人在國外所受歧視與奮鬥的歷程，代表着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的精神。第十四章敘述派遣幼童到美國，實爲中國近代化的重要里程碑；從留美到召回，更說明了當時政府的昏庸、腐化，這些都構成中國邁向革命的遠因。

當年顧維鈞博士曾說：「我不相信弱國無外交之說，唯其弱，故倚賴外交較強國更爲重

由權威教授
專家執筆的
翻譯天地
RENDITIONS MONTHLY
每冊 NT\$20
全年 12期 NT\$200
郵撥 111701
電話 3318080

明道文藝

郵政劃撥帳戶二六四六二號
地址：臺中縣烏日鄉中山路九九號
定價：每冊新臺幣三十元
全年（十二冊）二九〇元

要。」中美外交關係自「第一次中日戰爭」（一八九五年）後，表面上即日趨複雜，李定一教授指出：「此乃由於從那時候開始整個世界國際政治便更風雲詭譎，機詐萬端的原因，兩國關係在本質上仍極少基本的變動。這種情況一直發展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一九四五年）後，中美兩國的關係才開始摻入一些前所未有的新因素。」在「核子恐怖平衡」的今天，「兩極化」的政治運用，尤使人觸目驚心。歷史的教訓，使得人們能够趨於「理智」，此時此地我們應多作「知己知彼」的功夫，中美關係變化至今，我們實應正視史實，不僅從書中獲得「殷鑑不遠」的昭示，亦從此尋出我們應走的路向。